
中外名记者丛书

王 芸 生

周 雨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5 · 北京

责任编辑：颜景政

封面设计：郑炳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芸生/周雨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5. 11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19-4

I. 王… II. 周… III. 记者-王芸生-评传 IV. ①
K825.1②G2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475 号

王 芸 生

中外名记者丛书

著 者：周 雨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199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092 1/32

发行者：新 华 书 店

印刷者：北京科技印刷厂

印 数：7000

印 张：8 字数 170 千字

ISBN 80002-819-4/G·241

定价：10.90 元

目 录

人物评传	(1)
引言	(1)
刻苦自学成材	(4)
反帝斗争中展现才华	(7)
一场笔战为张季鸾赏识	(10)
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3)
动人心弦的爱国篇章	(17)
“不投降论”的悲壮呼喊	(20)
六寄北方青年	(23)
团结抗战的汉口岁月	(26)
风光的重庆时代	(28)
痛斥国民党统治阶层腐败行径	(31)
发起“爱恨悔”运动	(35)
几篇反共言论	(39)
关注东北问题	(43)
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45)
同情学生运动	(48)
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50)
遭受反动派围攻	(62)
历史的转折	(64)

来到解放区·····	(68)
为社会主义事业欢呼·····	(70)
反右斗争前后·····	(72)
致力于文史著述·····	(74)
为中日友好效力·····	(76)
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78)
受人敬重的爱国报人·····	(79)

作品选编 ·····	(88)
------------	--------

社评

不投降论·····	(88)
天时人事之雨·····	(90)
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	(92)
拥护修明政治案·····	(95)
看重庆，念中原！·····	(98)
为国家求饶！·····	(101)
晁错与马谡·····	(104)
日本投降了·····	(107)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11)
毛泽东先生来了！·····	(115)
莫失尽人心！·····	(118)
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	(121)
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	(123)
和平无望·····	(126)

大公报新生宣言·····	(128)
--------------	-------

专论

新闻事业与国难·····	(132)
重来上海（代跋）·····	(135)
我的人生观·····	(141)
《芸生文存》自序·····	(147)
招魂·····	(153)
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	(156)
由统一到抗战·····	(159)
论诸葛亮·····	(166)
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	(183)
论曾国藩·····	(200)
季鸾先生的风格与文境·····	(205)
一统与均权·····	(210)
我看学潮·····	(221)
北归杂记·····	(224)
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	(236)
我到解放区来·····	(239)
生平年表·····	(244)

人物评传

引言

王芸生，我国卓越的老一辈报人，著名的政论家，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社会活动家。

王芸生的名字是和大公报分不开的。他自己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有人认为这话有点过分，但长期以来，王芸生写的社评确实代表了大公报的基本态度。

大公报历史悠久，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买下了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成立新记大公报公司，开辟了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新时期。张季鸾的文章名噪一时。他立足于民族正义，忧国忧民，被称为“智虑高洁，老成谋国，富有民族感情的一代报人。”卢沟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坚决主战，不屈不挠，在群众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张季鸾久患肺病，力疾从公，终于1941年辞世。王芸生继承张季鸾衣钵，本文章报国之志趣，驰骋论坛，大公报在他主持下，取得公认的成就。

张季鸾在世时，王芸生写的社评基本上遵循张的“国士”之言，有的论点也反映了蒋介石的政策和思想。张逝世后，大公报的言论由王负责，王不通达国民党上层的政情，凭借他满腔爱国热情，多年从事言论写作经验，一事当前，习

惯于独立观察和判断，不苟同别人的意见。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他敢于仗义执言，不顾其它。

王芸生的政论，激情洋溢，如江河直泻，富于感染力。他文思敏捷，词锋犀利。撰写言论往往是成竹在胸，一气呵成。有时亲自制作头条标题，常有神来之笔。他谈锋很健，上下古今，见多识广，令四座风生。

王芸生接替张季鸾成为大公报总编辑的时候，正是外敌入侵，内政腐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严峻时刻。他大义凛然，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希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希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希望祖国和平、进步、繁荣、富强。他的政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知识分子阶层的愿望。他以自己的笔揭露国民党当局在京沪的掠夺性劫收，指斥“莫失尽人心”；同情学生运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随着时局的发展，王芸生和许多正直、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党的帮助下，逐步认清国民党独裁统治无可救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从上海出走香港，把香港大公报的立场转向人民方面后，奔赴解放区，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从香港到北平，路经华东解放区，耳闻目睹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新景象，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以“觉今是而昨非”的精神清算自己以往的政治立场。上海解放前夕，他庆幸大公报能保存原名，继续办下去。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杨刚陪他随三野陈毅司令员回到上海。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新生宣言》，郑重作了检讨，从这一天起，王芸生和大公报同仁就正式加入革命队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生，一个崭新的政权在祖国大地巍然屹立。王芸生满怀喜悦投入

到歌颂新的社会、新的制度的大合奏中。解放初期，适合国情民心、稳步前进的多项政策措施，除旧布新的政治运动，推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事业急速发展，王芸生紧握手中的笔跟着时代前进。

但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不断加剧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1953年9月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如狂飙突起，使王芸生几乎被无情的政治风浪吞没。1957年以后，他不再过问报社的业务，但依然紧握手中的笔，写大公报的历史，写文史论文等。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他修订了旧日成名之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一时期，他的文章不免多受时尚影响，沾染上一些“左”的色彩。60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写的《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对这份报纸，对他个人的作为，检讨自责，甚至有些自污。大公报故人依然对他满怀敬重予以谅解。这些言行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潮流分不开的，不能对他有所苛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冲击。当他奉派参与中日友好活动时，仍以满腔热忱接待许多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几度赴日访问，为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他撰写《台湾史话》，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多次为台湾回归祖国，为祖国统一呼吁。

王芸生的前半生处在国家多难的严峻年代，解放后三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一生磨难重重。这位秉性耿直，执著追求进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论是从事报纸言论，还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奔波，总是满腔热诚，全神贯注地工作，为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王芸生同志于1980年5月30日与世长辞！

刻苦自学成材

王芸生，学名德鹏。原籍河北省静海县。1901年9月26日出生在天津城西佟家楼村。他的父亲因家无立锥之地，不满十岁就流落天津当小玉，学会了做饭炒菜，便以此养家糊口。他的大哥后来也当了厨师，二哥给人家看门守院，都没有上学。他父亲决心让小儿子读书识字，据王芸生回忆：“我从能记事时起，父亲便教我认方块字，故在未入私塾以前已能认识几百个单字，但于写字则毫无训练，大概还不满六岁吧，被送入我族伯的学塾里读书。我这位族伯不仅教书，且会治病。我揣想他的学问并不怎样精深，医道恐怕也不怎么高明。不过因为他也是一个乡下人，所以无论教书或治病都很认真。他认真起来，教书时不顾死活地打学生，治病时也是咬牙发狠地收拾病人。事隔三十年，想起他打人时那份狠劲儿，我背上还觉得热刺刺的作疼；再想起那时看他把四五寸长的铜针扎进病人的肚子里的情景，我的神经还在震动。不满六岁的孩子，人又生得那么弱小，入学塾时还需要人抱上凳子，才能念“赵钱孙李”。就在入学的第一天，族伯教我写字，描写‘上大人’的红模子，我刚一动笔，笔尖刚刚接触纸面，不料背后藤条竹板疾风暴雨似地飞来。我挨了一顿臭打，事后才知道是因为我用左手提笔。这是我第一次挨先生的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学生是如何的没出息，而先生又是如何的认真。

凡事不可破例，此例既开，则此后打人与挨打便成为先生学生间的当然本分了。还记得有一次背不过书来，同学们都放学回家吃午饭去了，族伯把我一个人留在塾里，叫我跪

在院中六月的毒太阳底下，头上顶着一块砖头，手上托着一本书，砖头不许掉落，书还得念，念熟了背对了才许回家。这个没出息的幼稚生，浑身浴在火里，两膝跪得疼，脑袋压得不能动，泪水把眼睛封住，辨不清书本上的字，更流到嘴边，模糊了读书的声音。这样，书没法子念熟，族伯则若无其事的吃了饭打盹。同学们把这消息传到家里，母亲由村东赶到村西，到塾中来求情，总算族伯还讲人情，准许了母亲的请求，下了特赦令。当我用泪眼去望母亲时，母亲的眼泪也滚下了。”（《一个挨打受罚的幼稚生》原载《宇宙风》杂志54期）

两三个月后族伯病故，转到外号“鸽子王”的塾馆就读，这位塾师喜玩鸽子，不善教书，混了几年，又转到名陈楚珍的一位外号“陈扒皮”的塾师处就读。这位以打起孩子像扒皮一样狠而得名。王芸生自幼聪明好学，记忆力强，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过目成诵，三年间在五十多名同学中，他是唯一没有挨过打的优秀学生。

这个求知欲旺盛的孩子，读了八年私塾后，渴望报考南开中学，但是家里没钱交纳学费。不得已，十三岁时，便到一家小茶叶店当学徒，白天忙着裁纸、包茶叶，晚间偷空读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讲给左邻右舍街坊们听，很受欢迎。后来有个卖报小贩子，经常用一张《天津白话报》换包茶叶末，他开始接触报纸，从中知道了好多新鲜事情。逐渐地感到这份报纸不能满足他的强烈求知欲，便利用外出办事机会，贪婪地阅读马路边上的贴报。他对《益世报》副刊发生了兴趣，特别是一些影射时弊的小文章引起他的共鸣。遇到喜爱的小文章就偷偷挖下来，回去仔细琢磨。时间一长，发现这些小文章有规律可循，就萌发了给报纸投稿的念头。

他的第一篇稿子投给了《益世报》副刊，题目是《新新年致旧新年书》，写的是讽刺当时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段祺瑞不要尸居其位，该下台了。出他意料，第三天就在该报副刊《益智粽》登了出来，还给加了花边。第一次投稿成功，给他莫大鼓舞，同时也使之产生不切实际的妄想。他一时冲动，以为靠投稿能够赚钱，便向茶叶店掌柜辞活不干了，准备靠积攒稿费读南开中学。但是回家以后连报纸也看不到了，更谈不上写稿投稿了。不得已借住在城区的大姐家，为的是有机会阅读报纸，实现靠投稿谋生的计划。他整天下狠的写啊，一天一篇甚至两三篇寄出，都石沉大海，没见一篇登出，幻想就此破灭了。

为了生活，他又进了一家小布店当徒工，白天扛布、量尺，晚间抱孩子，打洗脚水，无活不干。只有夜深了，侍候掌柜一家歇息了，才用积攒的蜡烛头，偷偷地阅读一些文史类书籍，为此违犯了店规，被解雇了。

天无绝人之路。王芸生进入一个经营出口木材生意的天津禅臣洋行当徒工。这家洋行不同于独门独脸的小铺，它有个阅报室，备有一些报纸刊物供职工阅读。他每天下班就带着干粮走进来，直到闭馆为止。有几次读得入迷了，被管事的误锁在里边，他便彻夜不眠读个痛快。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运动风暴席卷了全中国，天津处于这一伟大运动的激流和漩涡之中，科学和民主的呼声唤醒了亿万青年。王芸生从报刊上既读到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潮，也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阐述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他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迪。他曾参加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行列。他回忆道：“我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惠是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

灭的。”

为了认识这个大千世界，他先参加英语函授，后又进入英语补习夜校，由于他能办理英文文牒，便从徒工提升为正式职员。生活条件改善了，1924年，奉母命与冯玉文结婚。冯生长农家，朴实憨厚，没有念过书，不识几个大字。抗战时期，有位文官考试女“状元”爱慕王芸生的文才人品，多次写信以身相许，王不为所动，他和冯玉文患难相扶，甘苦与共，终身相偕，感情弥笃。

反帝斗争中展现才华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天津各界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在成立大会上，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后来改出日报，定名《民力报》。在这张小报上，他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文章；他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也显露了他的才华。据王芸生回忆，在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他参加了国民党。

天津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反动统治者被革命声势吓坏了，军阀褚玉璞勾结帝国主义者，对爱国青年下了毒手，王芸生遭到通缉和追捕，身陷危险境地。1926年3月的一天，他乘轮南下到了上海，投奔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他被安排与秦邦宪（博古）先后合编《亦是》、《短棒》等周刊，后来改办《和平日报》。当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主旨是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控制国

民党的党权。王芸生耳闻目睹国民党右派言行，极为气愤，经秦邦宪帮助并和彭述之二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号召下，党员可以两党互跨）。

1927年春节临近，因老母病重，急电催他北归，于是在春节期间从上海赶回天津。不久，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所办的《华北新闻》写社论，继续从事反帝宣传活动。在此期间，王芸生曾和大公报展开了一场论战。经过是这样的：当北伐军打进南京时，1927年3月，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的奋起反抗，捣毁了南京一些外国领事馆。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为《华北新闻》撰写社论，抗议帝国主义残暴行径，声援第六军将士的正义行动。而大公报却发表了相反的言论，提出捣毁外国领事馆的责任问题。为此两报展开了一场辩论。在双方辩论中，大公报于1927年4月1日发表了由张季鸾执笔写的社评《躬自厚》。文章写道：

“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夥，其中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今之中外关系亦然。如其咎在我者，我应自责之，所谓躬自厚也。而为外人者，亦应自省其过去或现在之咎责，同时承认我国民一般之友谊，盖虽不敢望其自厚，而不得不劝其勿专责人也。”

文章缕述美、日在其国内种种排斥华侨事例后，写道：“吾人终信‘躬自厚’之说，应为中国自处之要义。不论何军或非军，苟扰乱秩序，损害人民，必应彻惩之。果军队也，必应处分之，不论其所伤害者为外人，或本国人也。政治之初等要素，为保持安宁秩序，不论为专制，为立宪，为英美式或苏俄式，亦不论其所持者为何主义与原则也。此而不能，则

浸假必至于灭亡，遑言外交乎。吾人虽责外人不应夸张，而实不能不望国民自责而痛加纠正之也。”

针对大公报上述论点，《华北新闻》于4月2日发表了王芸生执笔写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予以反驳。文中写道：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

事后，张季鸾得知文章作者，传话希望与王会晤。王芸生为此到大公报拜会了张季鸾，这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起了媒介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下，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挺进北京的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捕杀共产党人，迫害进步人士。《华北新闻》的社论不能照旧写下去了，王芸生的安全也成了问题，在朋友的掩护下，躲进了法国租界，受冻挨饿吃尽了苦头。他的二哥因受牵连被捕入狱，母亲因担惊受怕一病不起，接连灾祸临头，他感到一种幻灭的悲哀。据王芸生临终前回忆往事的录音：当时看到的是黑暗一片，加上党内纷争日烈，感到灰心失望了，决心脱离一切党派，专心做新闻工作，以文章报国。因此在1927年6月2日的天津大公报登了一则“王德鹏启事”：

“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所误会，特此声明。”此后他再没有和任何党派发生联系。

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芸生经历了一次大时代的洗礼，他的生活道路，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

来他在《芸生文存》(1937年大公报印制)的自序里这样写着：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下过去，孩童的脑中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枪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轲轳，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也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

一场笔战为张季鸾赏识

不久，天津《商报》创刊，他应邀于1928年5月出任该报总编辑。在该报任职一年多，因与报馆老板在观点上的争执，愤而辞职，并立即写信给张季鸾求助，张不愧是位爱才的伯乐，接信后，亲自登门把这位打过笔墨官司的年轻人接到大公报。王芸生于1929年8月22日在天津大公报上登了一则启事：

“芸生已于本月初辞去天津商报职务，此后友戚投函，请寄日租界大公报社收转可也。”

从此，王芸生的命运和大公报连成一体，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乱起，北京大公报被红卫兵查封，他任职历时37年之久。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1902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是以敢言著称的先辈报人，名噪一时。在他主持下大公报颇著盛名。1916年盘给皖系政客王郅隆后，一蹶不振，于1925年停刊。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伙从王郅隆儿子王景珩手上盘购下来，组成新记公司续办。三人中除了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都是办报多年的行家里手。胡政之于1913年任上海《大共和报》总编辑。王郅隆从英敛之手中买下大公报后，自任总董，聘胡政之任经理兼总编辑。1917年，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时，胡曾随段祺瑞赴马厂采访誓师，他写的言论报道轰动一时。1919年，胡代表大公报赴法采访巴黎和会，是和会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20年回国后，不满于报纸经常发表亲日言论，辞职去林白水主持的北京《新社会报》任总编辑。1921年到上海创办国闻通信社，1924年又办《国闻周报》。这部分人后来就成为续办大公报的班底。

张季鸾本着“言论报国”的志愿，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先是在上海帮助于右任办《民立报》，后因披露袁世凯向五国商洽“善后借款”，成了孙中山讨袁之役的导火线，被袁逮捕入狱。出狱后，历任《大共和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等报纸编辑、总编辑。

积多年办报经验，他们决心要办一张不受金权约束的文人论政的报纸。张季鸾在他写的《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中说过：“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拥护其党者，品优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无主张，遑言是非。”吴鼎昌也认为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由于资金不足，滥搞政治关系，拿人家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胡政之决心为中国报界辟一条新路，即办报的人要有政治兴趣而不应参加

实际政治，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

基于上述他们三人共同认识，在续办的创刊号上，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并以此为大公报社训。所谓“不党”，即“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即“本社同仁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报纸在他们三人锐意经营下，办得很有朝气，标题醒目，版式美观，尤其重视言论，它每天至少一篇的社评，能结合当天的新闻，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敢于批评时政，因此翕合人心，销路直线上升，续办时 2000 份，半年后升到 6000 份。

王芸生进大公报是因笔战得识张季鸾，但开始只任地方新闻编辑，次年编辑《国闻周报》，每周编写国内外大事记，并未参加言论写作。这因为续办之初，吴、胡、张商定由他三人组成社评委员会，分别撰写言论，最后由张季鸾定稿。这样坚持五六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开始吸收社内同仁写稿，最初参加写作的是王芸生、杨历樵、马季廉三人。每篇付酬银圆十元。比千字一元的一般稿费丰厚得多。